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资助
南华大学资助出版

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重点学科科研平台资助

湖南省教育厅课题资助

衡阳市社科基金课题资助

南华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资助

信息时代的 国家文化安全研究

Xinxi Shidai De
Guojia Wenhua Anquan Yanjiu

唐圆梦 张 华 / 著

台海出版社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资助
南华大学资助出版
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重点学科科研平台资助
湖南省教育厅课题资助
衡阳市社科基金课题资助
南华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资助

信息时代的国家文化安全研究

唐圆梦 张 华 著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信息时代的国家文化安全研究/ 唐圆梦, 张华著.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168-1040-8

I. ①信… II. ①唐… ②张… III. ①文化—国家安全—研究—中国 IV. ①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21447 号

信息时代的国家文化安全研究

著 者: 唐圆梦 张 华

责任编辑: 俞滢荣

版式设计: 三山排版

责任印制: 蔡旭

出版发行: 台海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南路 1 号

邮政编码: 100021

电 话: 010-64041652 (发行, 邮购)

传 真: 010-84045799 (总编室)

网 址: 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mail: thcbs@126.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字 数: 240 千字 印 张: 12.25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8-1040-8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社会生活方式的集中体现，是维系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牢固心理纽带和精神根基。在信息时代，文化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国家文化安全日益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成为国家安全的灵魂和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西方国家不断向我国进行文化扩张和意识形态的渗透，大肆兜售西方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严重危及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指导地位以及民族文化的安全。因此，在当前形势下，积极应对信息全球化的挑战，深入分析信息技术对我国文化安全的重大影响，努力探索信息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安全的应对策略，对于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始终保持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对于振兴我国文化产业和保障民族语言的安全，更好地发挥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本论文以信息时代为视角，采用历史的和逻辑的方法，试图通过从历史纵深角度来研究信息化与国家文化安全的关系并揭示国家文化安全地位凸现的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时期我国文化安全战略的思路。其中导论部分为提出问题，第一章至第五章为分析问题，第六章为解决问题。对于信息时代的国家文化安全的研究，本论文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和论述：

首先，本论文导论部分介绍了本课题研究的现状、意义、重点、难点、创新点及研究思路和方法，说明之所以选择文化安全研究的缘由。

本论文第一章是对信息时代与国家文化安全的基本理论进行现代诠释，界定文化、国家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化等相关概念，分析了传统安全观及其局限性，突出了在文化重要性凸显的当今时代，以文化安全为重要内容的新国家安全观的主要内容及其意义。

本论文第二章主要是分析信息时代文化安全的理论基础、理论借鉴以及现实由来。从理论来源看：马克思、列宁等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化重要性的论述成为文化安全的重要理论指导，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化领导权的分析以及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理论构成文化安全的理论借鉴；从现实来源看：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文化的侵蚀与意识形态的渗透是文化安全产生的外部原因，我国文化存在的自身不足是文化安全凸现的内在根据，信息技术的

迅速发展是文化安全产生的催化剂。

本论文第三章对信息化与文化安全的关系重新进行全面审视。信息化加速了国家安全由传统安全向非传统安全演变，国家文化安全日益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信息化对国家文化安全的影响突出表现在对文化知识、文化认同、文化主权的挑战，文化冲突也是文化安全的日常反应。

本论文第四章旨在分析文化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重大意义。本章首先从苏东国家在处理文化问题上的深刻教训入手，从反面来论述文化安全对国家的意义。在当今信息社会，文化与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密切相关，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灵魂，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文化影响力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与经济、政治日益交融，对经济、政治的反作用越发显著。

本论文第五章是分析信息时代中国文化安全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本章首先从三个方面分析了信息时代我国文化安全面临的机遇：信息化提升了文化创新的平台，信息化拓展了文化发展的空间，信息化助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接着重点考察了信息化给我国文化带来的威胁，全面阐述了中国社会当前面临的文化严峻现状，仔细分析了民族文化、社会主义理想和道德、文化产业、文化传播以及语言文字安全受到的强大冲击和挑战。

本论文第六章论述信息化条件下中国文化安全战略选择，阐述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具体措施，以及采取何种有力手段来保障这些措施得到有效的实施，这是本文的重点章。在这章指出，由于信息化条件下中国文化安全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威胁，因而谋划国家文化安全战略、作出科学的战略选择是维护中国文化安全的当务之急。最后详细论述了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对策，即：健全国家文化安全网络机制；发展物质文明，壮大文化产业；大力发展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等。

结束语部分对全文作了简明扼要的总结，展望了信息时代我国文化建设的未来。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信息时代与国家文化安全的基本概念	14
第一节 信息时代与文化安全的概念厘定	14
一、信息时代的内涵	14
二、信息全球化的内涵	15
三、文化安全的概念	16
四、国家文化安全的分级及评价指标	20
第二节 信息时代与文化安全的相关概念界定	22
一、信息化的内涵	22
二、文化、文化学的概念界定	23
三、传统国家安全观及其局限性	26
四、当今世界的新安全观及其主要内容	30
第二章 信息时代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由来	32
第一节 文化安全问题的理论基础	32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化的论述	32
二、列宁对文化重要性的分析	39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文化安全思想	42
第二节 文化安全问题的现实由来	57
一、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侵略是文化安全产生的外部原因	57
二、我国文化存在的自身不足是文化安全凸现的内在根据	58
三、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是文化安全产生的催化剂	59
第三节 文化安全问题的相关理论研究	60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革命思想	60
二、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理论	64
第三章 信息时代国家文化安全的基本内容	72
第一节 信息全球化对文化的影响	72
一、信息全球化加剧了文化的商品化和大众化	73
二、信息全球化冲击了文化的封闭性,加重了文化的“不安全感”	74

第二节 信息全球化与文化认同安全	75
一、信息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认同危机	75
二、文化认同危机的根源	77
第三节 信息全球化与文化主权安全	78
一、维护文化主权的原因探析	78
二、网络发展与文化主权	81
三、文化主权与国家安全	81
第四节 信息全球化与文化冲突	83
一、信息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冲突的特点	83
二、信息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冲突的原因	85
第四章 信息时代国家文化安全的战略地位	87
第一节 国际社会中的国家文化安全战略与实践研究	87
一、国家文化安全是信息时代的国家大战略	87
二、苏联在处理文化安全问题上的深刻教训	88
第二节 信息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在我国战略地位	91
一、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灵魂	91
二、文化安全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兴衰成败	93
三、文化安全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96
四、文化安全是重塑国家形象的需要	98
第五章 信息时代我国文化安全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101
第一节 信息时代我国文化安全面临的机遇	101
一、信息化提升了文化创新的平台	101
二、信息化拓展了文化发展的空间	103
三、信息化助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	106
第二节 信息化进程中我国文化安全正面临严峻的挑战	107
一、互联网的普及挑战国家文化安全	107
二、互联网的普及加大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构建的难度	110
三、西方借助网络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进行侵蚀	111
四、信息全球化使政治文化面临更大威胁	119
五、信息全球化导致我国文化产业举步维艰	123
六、互联网上的强势语言威胁中国语言文字安全	129
七、信息时代下的民族分离主义和宗教文化安全	132

第六章 信息时代中国文化安全的战略选择	136
第一节 加强网络建设, 构建维护文化安全的网络战略	136
一、加强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巩固网络文化阵地	136
二、加强互联网上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的建设, 弘扬主旋律	138
三、建立国家文化安全网络预警机制, 增强国家文化安全的预防性	140
四、不断加强文化立法和网络立法, 为国家文化安全提供法律保障	142
五、提高网络安全意识, 建设高素质的网络专业队伍	144
六、推动建立“国际信息新秩序”, 构建公正平等的国际信息环境	146
第二节 发展物质文明, 壮大文化产业	147
一、大力发展经济, 夯实国家文化安全的物质基础	147
二、壮大文化产业, 维护文化经济安全	151
第三节 大力发展中国先进文化, 提高公民文化安全意识	156
一、中国先进文化的内涵及特征	156
二、发展中国先进文化的途径和方法	159
三、重视文化安全教育, 提高公民文化安全意识	165
第四节 加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 推动建立国际文化新秩序	167
一、和谐文化的内涵及特征	168
二、努力建设和谐文化, 保障国家文化安全	170
三、推动建立国际文化新秩序, 为我国文化安全赢得良好的国际环境	174
结束语	177
主要参考文献	179
后 记	188

绪 论

一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信息科学和技术在全球范围的深入发展和广泛应用,人类进入信息时代。网络技术目前已广泛地渗透在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发展模式和人们的工作、思维方式。据研究咨询机构 IDC 最新研究报告显示,2016 年全球互联网用户数将达到 32 亿人,约占全球总人口数的 44%,其中,移动互联网用户总数将达到 20 亿¹;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 2015 年 12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 6.88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50.3%,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 6.20 亿,有 90.1%的网民通过手机上网。²信息化时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巨大优势,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展开了大规模的文化扩张和文化渗透。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又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我国面临西方发达国家文化霸权的压力和挑战更为严峻,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任务也更为艰巨。对此,我们需要树立正确的国家文化安全观,建立、健全国家文化安全机制,以有效地保障好我国的国家文化安全。本文以“信息时代国家文化安全研究”为主题,准确定位我国文化在信息时代的基点和坐标,正视我国文化安全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充分认识国家文化安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益指导。具体说来,本文选题的依据是:

首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深入,给文化安全的研究提出了新任务。当今社会,我国正处于大调整、大变革时期,处于现代化建设的攻坚阶段,此时,“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³一方面,我国当前正在进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要求建设一种适合现代化建设、适合综合国力、

¹ 2015 年 12 月 21 日【西班牙】www.cibersur.com

² 《第 37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http://www.cnnic.net/hlwfzyj/hlwxbzg/hlwjtbg/201601/t20160122_53271.html

³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全文)》, <http://www.sina.com.cn/> 2011 年 10 月 26 日 00:19 新华网

适合国民素质的新文化。这样,如何评价和对待我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如何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便呈现在我们面前,促使我们积极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另一方面,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以及社会的急剧转型,激烈冲击着我国内部文化,使主流意识形态面临边缘化的危险。在市场经济下,随着国内社会经济成分的日益多元化,不同的利益主体纷纷涌现,各种社会思潮竞相迸发,社会原有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在不断解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凝聚力在不断消解。我国当前的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与综合国力、与人民素质都已经不相适应。严峻的现实告诉我们,改革的阻力越来越不是来自经济方面,而是来自文化方面的不相适应。这就推动人们去深刻反思传统文化,努力探究文化创新的新思路。

其次,信息的全球化进程,对文化安全的研究提供了新视野。信息全球化进程与文化领域的争锋往往如影随形,随着信息化进程的加快,文化领域的斗争日益激烈。一方面,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已经逐步对外国信息产业、资讯、影视乃至传媒实行国民待遇,对管制领域全面加以解禁,因而我国的文化环境在面临着机遇的同时,更面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以因特网的发明和使用为标志的信息革命加剧了不同文化的交锋,加大了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难度。在信息时代日趋激烈的文化战争中,广大发展中国家都难以抵挡和阻碍文化霸权进攻的浪潮。“这是基于科技理性凌越人文的基础之上,物质性指向的生产力向人文领域渗透的又一表征,不仅形成历史性意义上的文化割裂,而且在横向的文化传播上也给文化产业小国纷纷带来灾难。”¹

再次,文化重要性的日益凸显,为文化安全的研究提供了新路径。文化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和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对世界进行整体文化认知和建构的要求,是文化价值日益凸显的变现。在信息化的进程中,不同地区的人们因交流的需要,迫切要求相互了解对方的价值观念和理想信念。文化不仅能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而且文化作为一种产业,日益成为国民经济的新的经济增长点。文化日益与政治、经济相互交融,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文化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软力量,对国家、社会发展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²而随着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缩减,世界不同民族文化力量的严重失衡,世界渴盼多元价值和谐并存,许多国家高度重视文化的作用,

¹ 朱传荣:《试论面向21世纪的中国文化安全战略》,载《江南社会学院学报》,1999,(1)

²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全文)》,http://www.sina.com.cn/ 2011年10月26日00:19 新华网

积极采取措施维护主流意识形态，这大大促使了众多专家、学者纷纷把目光投向文化安全研究。

二

在信息时代的今天，文化安全是一个关乎国家存亡的重大问题。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文化不仅是其和世界其他民族相区别的显著标志，同时也是确认其人类学身份的内在依据。联合国开发署（UNDP）在 1992 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首次把文化安全列为人类社会应该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力。文化的状态沉积着一个民族和国家从前的全部精神成果，蕴藏着它们走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基因，是决定其之所以存在的全部合理性与合法性之所在。文化是一种能够凝聚和整合民族和国家一切资源的根本力量，这种力量的任何形式的丧失，都将构成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生存安全。基于对国家文化生存状态的关注和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的认识，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理论研究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信息时代的国家文化安全研究是一个新兴的课题，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虽有人涉及，但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都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学者们在关于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做了很多研究，而从信息化这一视角来研究文化安全明显滞后于当今社会现实。“自从有了国家，也就有了国家间的军事威胁。但人们把军事威胁称为传统安全威胁，是在国家安全概念和新安全观提出以后。1943 年美国专栏作家李普曼首次提出了‘国家安全’。因此，传统国家安全指的主要是国家军事安全。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人们便把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安全观称为传统安全观，把军事威胁称为传统安全威胁。”¹在信息时代，威胁国家安全的主要因素已经不再是军事等传统因素，传统安全观已不能充分满足一个民族或国家维护自身安全的需要，更不利于全人类的整体发展。人们于是重新审视国家安全观，纷纷把重点投向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非传统安全问题主要包括经济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等，它是除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以外的，对一个民族或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之一。在非传统安全中，文化安全是一个新的领域，它已经日益引起了我们党和政府的重视，但有很多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们，还急需进行透彻的研究，这就不利于我国文化安全问题的解决，甚至会直接影响国家的根本利益。本文通过分析冷战后国际安全形势发生的深刻变化，突出了国家文化安全在新的国家安全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提出了新时期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战略决策，重新探索了文化的本性以及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安全理论，丰富、发展了非传统安全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

¹曹泽林：《国家文化安全论》，军事科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 10 页

科学估量信息时代的文化安全趋势和特点提供了正确考察的科学理论工具。

江泽民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¹信息全球化促使安全的内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非传统安全的影响和地位日益重要。国家安全不仅仅指军事和领土等传统安全，还包括经济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其中，文化安全越来越受人瞩目，已经成为国家安全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信息化的浪潮中，经济日益向文化渗透，文化不仅是事业，更是产业，文化生产力已经受到很多国家的高度重视。信息化刺激和助推了文化商品流动和文化形态碰撞，传统的文化形成和传承越来越失去固定的空间，发展中国的文化主权受到严重的威胁和挑战。威胁我国安全的文化因素，既有外因也有内因。外因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文化侵略和渗透。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采取了“和平演变”战略，妄图改变我国人民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最终改变我国的意识形态。内因则是多年来我国的文化建设始终存在着一些问题，多元文化没有与政治体制完全相一致，并且二者之间越来越对立。文化的多元性与政治上的核心价值、文化的大众化与政治上的国家至上，学术政治化与文化科学性、政治体制相对封闭性与文化开放性之间还存在诸多矛盾。特别是我国当前正处在改革开放、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经济成分日益复杂，社会利益主体更加多元，社会生活越发多样，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国家文化安全更是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化建设滞后，以及没有建立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内化到人们思想深处的意识形态、道德思想、政治文化。苏联解体的原因从反面证明了文化的力量和文化安全的重要性。因此，在我国当前深化改革、全面推进开放的新时期，我们不仅要发展高度的物质文明，还要建设先进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维护好国家的文化安全。只有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前提下才能继承和发展我国的传统文化，才能为建设先进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提供重要保障，才能抵御国外强势文化对我国文化的入侵，才能提高我国的软实力，从而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国家的繁荣富强。故而研究信息时代中国安全的发展新态势，提出维护中国文化安全的新战略，为我们积极应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挑战，更好地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有利于增强我国的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自豪感，有利于实施和谐文化战略，推进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同时也对于发展中国家反对文化霸权主义、拓展安全空间以及维护世界和平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¹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

三

当今信息时代,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我国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¹。文化安全已经从幕后的理论话语成为走向前台的现实生活话语,它是国家安全的灵魂,直接关系到民族的荣辱兴衰。因而国家文化安全日益成为我国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问题,越来越受到学者、专家的广泛关注和研究。林宏宇在1999年8月发表的论文《文化安全:国家安全的深层主题》是最早研究文化安全问题的文章,开启了研究国家文化安全的大门。2005年,胡惠林著的《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一书是第一本系统、深刻研究文化安全问题的专著,建立起了文化安全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掀起了学术界研究文化安全问题的热潮。本部分以国内外关于文化安全研究的主要著作作为素材,从国家文化安全相关内容的国外研究、国家文化安全的国内研究、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的评析与展望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国家文化安全”的概念是由中国学者率先提出来的,国际学术界在涉及文化安全研究时,往往是内涵于“非传统安全(non-traditional security)”、“文化例外(cultural exception)”、“文化多样性(cultural diversity)”这样的概念中。在西方,从15世纪开始,西方国家的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就非常关注文化安全方面的相关研究。而文化安全真正进入国际政治范围的研究领域,我认为应该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以冷战结束为时间分隔线,西方对于国家文化安全的相关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冷战结束前。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偏向对传统国家安全观的研究和分析,开始初涉非传统安全问题,有些著作已经提及了文化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但主要是为论证如何更有效地维护国家经济、政治利益和军事安全服务。代表性著作有:利德尔·哈特的《历史上的决定性战争》(1929年),哈罗德·拉斯威尔的《世界政治和个体安全困境》(1965年),F·皮尔森的《文化战略》(1970年),约翰·柯林斯的《大战略》(1973年),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合著的《权力与相互依赖》(1977年),萨义德的《东方主义》(1978年),罗伯特·巴奈特的《超越战争:日本的综合国家安全观》(1984年),彼德曼·戈尔德的《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1990年)等。上述著作的共同特点是,对于传统的军事、政治安全论述是浓墨重彩,而对于国家文化安全方面的研讨,无论是数量还是深度都明显欠缺。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阶段,有些著作也初涉了文化、精神等力量的

¹本书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作用。1929年,利德尔·哈特在其《历史上的决定性战争》一书中提出“大战略”的概念,初涉了精神力量的作用。1970年,F·皮尔森在《文化战略》著作中,从科学的层面上提出了“文化战略”这一概念,详尽分析了文化战略的重要性,认为文化战略是一种人类运用智慧谋求生存和发展的重大战略。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人类处于转折点》等报告,率先预警了人类社会面临的某些非军事性灾难,这些灾难必须依靠文化力量才能最终解决。¹1973年,约翰·柯林斯在著作《大战略》中指出了政治和心理作用的重要性,认为大战略是“发展和使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心理力量,以实现按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²。1977年,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合著的《权力与相互依赖》中提出了复合相互依赖理论,研究了“非物质性权力”对于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1978年,萨义德在出版的《东方主义》一书中指出,19世纪西方国家眼中的东方世界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西方文化中对亚洲和中东长期错误和偏见为欧美国家的殖民主义提供了借口,西方人对西方文化的生活的理解,必须借助文化霸权的力量。

第二阶段:冷战结束以后到现在。冷战结束以后,原来的安全模式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新的国家安全观亟需形成。在这一阶段,众多专家、学者紧密结合世界形势的变化,试图跳出传统安全的固定思路,转向从非传统安全的新视角探讨国家安全。还有些西方理论家把对文化战略的研究和时代特征、世界格局、国际形势结合起来,积极探索文化战略的理论基础。较具代表性的著作主要有: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1990年),约瑟夫·奈的《注定领导: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1990年)、《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1990年)和《软实力: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2004年),巴瑞·布赞的《认同、移民与欧洲的新安全议程》(1991年)和《新安全论》(1997年),约翰·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1991年),Dward C. Stewart和Milton J. Bennett合著的《美国文化模式:跨文化前景》(1991年),阿芒·马特拉的《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1992年),沙因的《组织文化与领导》(1992年)弗郎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和最后一人》(1993年),L. Robert Kohls和John M. Knight合著的《发展中的文化间视野:跨文化训练手册》(1994年),大卫·鲍德温的《安全研究与战争的终结》(1995年),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5年),彼德·卡赞斯坦的《国家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的规范与认同》(1996年),戴维·莫利与凯文·罗宾斯合著的《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1996年),巴瑞·布赞的《新安全论》(1997),Michael H. Prosser和K. S. Sitaram合著的《公民话语:文化间的、国际化的和全球的媒介》(1999年),克雷格·斯奈德的《当代安全与战略》,萨义

¹王逸舟:《重视非传统安全研究》,载《人民日报》,2003年5月21日

²吴春秋:《浅谈“大战略”“国家战略”》,载《世界知识》,1984年第12期,第2页

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2001年),查洛特·布莱斯顿的《冷战后的安全模式》(2002年)。这些著作分别从不同视角研讨了文化因素对于国家安全和国际政治的重大作用,探究了文化的本质与力量。有些还重点探究了全球化与文化的关系,以及文化冲突对于国家安全的作用,其中典型的观点有文化多极化、文化混合化、文化趋同化理论,如亨廷顿认为世界文化必然是多样的文明,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是导致国际动荡的根本因素;福山认为人类意识形态的最终演变结果为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西方的自由民主是人类政治的最佳选择和最后形式;戴维·莫利与凯文·罗宾斯通过探析信息技术条件下,文化认同的作用以及人们重塑集体文化认同的方法,认为世界文化正在趋同化。而德国学者哈拉尔德·米勒的“文化共存理论”认为,民族文化差异虽然明显反映出了在文化方面的对抗性,但是也体现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所以各国应该是以一种宽容的、互相利用的态度来对待文化的差异,使不同民族文化能够和谐共存。此外,巴瑞·布赞运用新的分析框架,探究了超出传统军事和政治领域安全以外的更宽泛的安全范畴,从而使安全议程得以扩大。¹萨义德、德里克等后殖民文化批判理论家通过分析造成西方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的根源,认为西方不仅仅拥有强大的经济、军事力量,还具有强大的文化优势。沙因专门研究了组织文化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沙因认为,组织文化这一理念可以解决群体的外部适应和内部整合的问题。彼德·卡赞斯坦运用建构主义理论,研究文化规范和文化认同对国家安全的影响。David Holmes、Kevin A.Hill 和 John E. Hughes、S.K.Bansal 等从论述互联网对国内政治影响和社会影响的范围来审视信息技术对文化安全的影响。在此阶段,最有影响力的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²。这些著作作为西方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国家安全,实现传统国家安全观向非传统安全观的转变开辟了崭新的研究道路。

我国自近代鸦片战争文化安全危机的来临到现代五四运动文化安全问题的凸显,文化安全日渐引起国人的警觉。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制度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成为“冷战”时期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内容。随着“激烈干涉”的“冷战”时代的结束与“和缓渗透”的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西方的文化侵略更具广泛性和隐蔽性。我国学者对国家安全研究起步晚,始于20世纪90年代左右,但受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我国众多学者在研究国家安全时,常常对国家文化安全问题进行了重点探究。概括说来,最新有关国家文化安全的著作主要有:张骥、刘中民著的《文化与当代国际政治》(2003年),马维野主编的《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2003年),胡惠林著的《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2005年),于炳贵、郝良华的《中

¹[英]巴瑞·布赞著,朱宁译:《新安全论》,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

²[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国国家文化安全研究》(2007年),耿立云的《和谐社会进程中的文化安全研究》(2007年),王佐书的《中国文化战略与安全研究》(2007年),潘一禾的《文化安全》(2007年),喻发胜的《文化安全:基于社会核心价值观嬗变与传播的视角》(2010年)等。此外,孙宁、沈洪波、包仕国、李金齐、曲文波、戴晓东等写作的博士论文分别都对文化安全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综合中国期刊网专题全文数据库的检索结果显示,从1979年到2012年期间,发表题名含有“文化安全”的论文有700多篇,包含硕士论文35篇和博士论文5篇。其中,少数是论述我国国家文化安全,大量的是涉及不同领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或具体每个人的文化安全观。而在此研究中并含有“信息”词条的文化安全的期刊论文只有14篇,硕士论文1篇。如果把题名范围进一步缩小到国家文化安全并含信息词条,仅有期刊论文3篇。由此可见,一方面文化安全越来越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他们分别对国家文化安全的概念、特征、面临的问题及其原因等做出了细致的探讨,另一方面,当前从信息时代视角研究文化安全文章太少,更未见专著对此问题的研究。综合来看,学者们对国家文化安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六个层面上。

一是从全球化的视角来分析文化民族性与文化开放性对于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意义。如包仕国的《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文化安全的衍进与重构》,曹骏的《全球化与中国国家安全》,沈洪波的《全球化与国家文化安全》等。

二是从阐释、批判西方理论着手,研究我国文化安全面临的外部严重威胁以及国家内部环境的巨大挑战。如花建的《软权力之争:全球化视野下的文化竞争潮流》,孙晶的《文化霸权理论研究》,潘一禾的《文化与国际关系》和《文化安全》,张骥、刘中民的《文化与当代国际政治》,俞新天的《国际关系中的文化》,胡惠林的《论20世纪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形成与演变》等。

三是从文化生产力、文化经济利益层面研究文化安全问题。如胡惠林的《文化产业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邹广文的《全球化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李孟刚的《产业安全理论的研究》,张彩凤的《全球化与当代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等。

四是从文化战略、文化对策方面对文化安全问题进行探讨。如叶南客的《文化中国》,张玉国的《国家利益与文化政策》,王佐书的《中国文化战略与安全研究》,张骥的《中国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战略》等。

五是从文化认同视角来探究文化安全,高度重视民族文化认同对于维护文化安全的意义。如郑晓云所著的《文化认同论》。华东师范大学俞楠的博士论文《“文化认同”的政治构建:当代中国公共文化服务战略研究》以及北京师范大学王成兵的博士论文《当代认同危机的人学探讨》等。

六是从信息时代的角度研讨互联网给文化安全带来的新变化。如张新华的《信息安全:威胁与战略》,蔡翠红的《信息网络与国际政治》,王国荣的《信息化与

文化产业》等。

综上所述,国内学界更多的是研究全球化的视角下维护文化安全的重要性及其对策。国内学者的研究范围一般比较狭窄,且研究多局限于“文化霸权”、“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必要性”、“文化产业建设”等方面。当前,在国家文化安全的研究方面,国内大多数专家、学者仍是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进行的,而从信息时代的角度研究文化安全的,不仅数量少,而且深度明显欠缺。迄今为止,国内还没有一部系统、深入研究“信息化时代国家文化安全”的专著,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还不够全面,还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以西方学者在国家安全的文化领域中的研究为参照,以当今世情、国情为依据,我国学者在文化安全领域的研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第一,关于国家文化安全的学理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文化安全研究诚如韩源所言:“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随着讨论的日趋成熟,基本理论问题的进一步澄清成为继续深入研究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瓶颈’”¹。不少研究者侧重于实践应对,大都从具体事实出发,揭示了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但缺乏对文化安全内部结构的系统认识,所进行的研究甚至是西方学者研究翻版,尤其对文化安全的理论来源研究明显欠缺,对于马克思的精神生产理论同文化安全的联系基本未涉及,因而我们务必加强文化安全理论体系的建构。

第二,对于破解文化安全的路径探讨需要加强有效性和针对性。我们研究国家文化安全的目的就是要推进中国先进文化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但我国学者往往对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研究存在片面性,没有充分认识到政府在文化安全中的文化责任和职能转变,从而导致了政府操作层面与学术研究层面相脱节。研究者对解决文化安全问题的对策,缺乏有效性和现实针对性,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难以进行实际性的操作。

第三,关于文化安全研究的视野需进一步拓宽研究。迄今为止,我国学者虽然广泛地探究了文化安全的重要性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保护、发展和繁荣问题,但研究的子系统之间缺乏紧密的逻辑联系,相比西方学者对国家安全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其研究的范围明显要比“国家安全的文化”领域要少得多。文化安全的研究除了理所当然要涉及政治学外,还涉及文化哲学、国际关系学、民族学、社会学、经济学、传播学等多个学科。因此,文化安全研究应从多学科入手,以历史的辩证的观点,运用系统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去研究这一课题。

第四,文化安全研究的宏观把握与微观切入需要有机结合。我国学者常常从政治立场采用意识形态标准对文化安全问题进行宏观定性分析,较少从微观方面

¹韩源:《国家文化安全引论》,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6期,第90页